



□ 余大庆

区别于字面上的长江以南自然地理概念，文化江南的地域范围在中国历史上代有盈缩，但到了明清时期大体确定为长江三角洲太湖流域，而其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便是苏州。因此谈江南文化，就不得不谈苏州。

仰天抚民的道山文脉

清人赵执信《苏州府学杂题四绝》吟唱道：“南园千亩任流萤，谁为王家更勒铭。一种迎春与消暑，时人剩上道山亭。”姑苏城外群山簇拥，但城内府学这座人工堆砌的小小土山却丝毫不减其光辉。

北宋景祐二年，范仲淹调任祖籍地苏州，为建居宅找到了五代时期留下的这片园林遗址。有人说，这是块宝地，住这里可以世世代代高官显贵。范仲淹听后却说，“吾家有其贵，孰若天下之士成教于此，贵将无已焉”。毫不犹豫地將房地献出，奏请朝廷批准设立苏州府学文庙，以期培养更多人才。于兹大兴土木、拓地凿池，垒土成山，因其为传道授业之所而名为道山。范仲淹捐宅兴学、“庙学合一”在当时影响极大，是中国历史上将文庙与州学（府学）相结合的创举。各地州、县学纷纷效仿。据说江南文风的昌盛即得益于此，并有了“苏学天下第一”的说法。这里在1035—1113年为苏州州学，1113—1276年改称平江府学，1276—1367年称为平江路学，1367—1904年才叫苏州府学。清康熙五十二年，被誉为“天下第一清官”的理学家、江苏巡抚张伯行在苏州府学里创设了紫阳书院。1927年以后为苏州中学所在地。

道山所在的学府以独树一帜的教学方法和理念，为传承江南文脉和培养人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范仲淹聘请宋初理学家胡瑗主持教授，分斋授课，讲“明体达用之学”。紫阳书院时期，在当时读书人都想走“学而优则仕”这个独木桥时，以沈德潜、钱大昕等为代表的饱学之士倡导了“不以科考为务，不为专写八股文而学八股文，而是要培养一流经学人才”的先进教育思想。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微言大义整理出来，阐发出来，为江南文脉的生生不息作出了巨大贡献。书院虽然在现代成了一所中

学，但文脉传承使它在基础教育领域别具一格。1927年，爱国教育家汪懋祖组建苏州中学并任校长。钱穆、吴梅、吕叔湘、杨人楩、颜文樾等几乎同时任教于校，师资力量相当雄厚。

与府学合一的文庙里，最耀眼的是4块碑刻：《天文图》《地理图》《帝王绍运图》和南宋版苏州市区地图《平江图》。这4块宋碑合起来有个非常大气的简称——“天、地、人、城”。庆历元年，范仲淹主持西北防务时，青年张载上书与他谈兵事。范仲淹教导他“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并因材施教，勉励他研读《中庸》，终于成就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一代大哲。

而今道山上的歇山顶建筑，仍挂着“道山亭”的旧牌匾，可以遥想当年“光风霁月”的景致。在时光烟云的深处，数千年学子的琅琅书声，在古老苏州、美丽江南，在辽阔中华大地上久久回响、生生不息。

诗意栖居的桃花坞才情

江南有一个桃花坞。在阊门河附近，过石塘桥，出了齐门，就到了古时的桃花河一带，再往西北方向去就是桃花坞。宋朝田园诗人范成大《阊门泛槎》有“桃坞论今昔”之句，说这里是风景优美的世外桃源。这里还是苏州的文化地标，浸染着江南的秀逸民风，彰显苏州的繁华市井。唐寅（字伯虎）是江南才子的代表人物，在书法、绘画、诗文、藏书方面均大有成就。他科场失意，落拓半生，在苏州城内桃花坞筑桃花庵，与好友祝允明、文徵明等日饮其中，蔑视世俗，狂放不羁，自称是隐居于苏州桃花坞里桃花庵中的桃花仙人，曾作《桃花庵歌》以言志。全诗画面艳丽清雅，风格秀逸清俊，音律回风舞雪，意蕴醇厚深远。才子们纵身心于山水林泉之间，所得到的是对自然和人生诗意的审美愉悦。唐伯虎去世后墓葬在桃花坞旁边，他作于桃花坞的《桃花庵歌》传诵至今，那句“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依然为人们所铭记。

旧时苏州的书香门第大多聚集在桃花坞。除了唐寅故居外，名医

曹沧洲也曾居住在此，环秀山庄、艺圃这两座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园林也在附近。在这么多文人雅士的汇聚之地，自然衍生出一些有名的手工艺品，比如“苏州版”年画——桃花坞木刻年画。在旧时苏州城最繁华的金门、阊门一带，桃花坞木刻年画的生产质量、数量都很高，和天津杨柳青成了中国南北两大民间年画的代表。

回首那走出了金圣叹、冯梦龙，走出了江南才子唐伯虎等吴门画派的桃花坞，令人不禁悟到，那曾经的街巷繁华，夜夜笙歌都藏在桃花坞的斑驳石板中，凝结成江南人骨子里的诗意基因。

巧夺天工的香山帮工匠

苏州最高峰穹窿山因军事家孙武子在此著作兵法被称为智慧山。太湖之滨、穹窿山的东南支脉香山，在江南文化中有着较为特殊的意义。唐《吴地记》：“香山，吴王遣美人采香于此山，以为名。”但让此山在后世声名远播的不是吴王，而是代代工匠。苏州的建筑师，除了贝聿铭，还有一个历史更悠久的群体，他们曾经代表了苏式建筑的最高峰，将苏式建筑工艺带到了全国乃至世界，被誉为中国古代史上最后的大工，他们就是香山帮。

香山帮鼻祖就是北京天安门城楼和故宫的设计者蒯祥。蒯祥的父亲蒯富，有高超的技艺，被明王朝选入京师，当了总管建筑皇宫的“木工首”。蒯祥子承父业，也任“木工首”，后任工部侍郎，被称为“蒯鲁班”。蒯祥在建筑学上的技艺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他精通尺度计算，每项工程施工前都做了精确的计算，竣工之后，位置距离、大小尺寸，与设计图分毫不差，其几何原理掌握得相当好，榫卯技巧在建筑艺术上有独到之处。蒯祥不仅木工技术纯熟，还有很高的艺术天賦和审美意识。在北京皇宫府第的建筑中，蒯祥将江南的建筑艺术巧妙地运用上去，采用苏州彩画，琉璃金砖，使殿堂楼阁显得富丽堂皇。蒯祥之后，从匠心独运的苏州古典园林到气势恢宏的北京皇家官殿，都展现了数百年来苏州香山帮匠人代代相传的精湛技艺。香山帮

匠人的杰作苏州园林和明代帝陵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20世纪初，苏州营造世家姚承祖撰著《营造法原》一书，将香山帮的工艺汇集书中传于后世。

提到钻研技术、著书立说，在古老苏州并非建筑行业的独有现象。明清时期苏州的一批文化匠师同时具备学者与工匠两种素质，追求“习艺求名，志在不朽”。明末苏州人孙云球身处乱世、家道中落，于是放弃举业，改习匠作，有了许多制造发明并撰写了一部著作《镜史》。另一位造镜名匠和机械大师薄珩，通过自学天文、数学和机械制造及自设实验室刻苦钻研，掌握了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创制望远镜并安装在大炮上，成为民间有名的制造匠师和工业科学家，著有《格物论》百卷。造园艺术家计成不仅精通造园技艺，而且还是工诗善画的文士，著有园林艺术理论专著《园冶》。及至近代，苏绣大师沈寿，也继承了苏州文士与工匠结合的传统，对一生刺绣技术进行理论总结，口述了一部《雪宦绣谱》。

香山帮只是江南工匠的一个代表群体，明清苏州的辉煌离不开各行各业众多巧夺天工的工匠们。他们一代又一代，用自己精湛的技艺、敬业的精神，将心血和智慧投入所从事的行业，打造了“苏作”品牌，实现了从“苏湖熟天下足”到“衣被天下”的“产业”转型，在江南揭开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序幕。

古诗云“三生花草梦苏州”。江南，曾经是中华先民的美好向往。道山的天地之心生民之命是中华先民世代传承的道德价值，香山的工匠精神体现了脚踏实地的工具理性，再加上桃花坞，这三个文化地标代表了江南文化厚重丰富的价值内涵。文化江南的星空大地孕育了我们民族传统资源中现代性的文化基因。正是由于江南的文化优势，长三角都市圈才有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的排头兵。今天，文化江南的星空大地继续映照、承载着这里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



在世界众多的政党中，有的昙花一现，有的老党最终丧失执政地位，有的治国能力不足乃至国内一团乱象。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百年大党，从革命、建设到改革，带领全国人民栉风沐雨、砥砺前行，创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的：“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这一百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为什么能够历经百年而生机勃勃、风华正茂？从根本而言，这是由党的类型与特点决定的。那么，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类型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所谓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宗旨，以实现自身民族、国家的解放和发展为自觉使命，以推进世界大同、实现共产主义、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使命的一种政党类型。正是基于这种政党类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高度强调，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进而言之，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具有什么特点？换言之，哪些特点助其成功？在此，有三点尤为重要。

其一，明确的使命担当。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就承担着三重历史使命：一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其中一句，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就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重温入党誓词，提醒全党要坚定共产主义信仰。二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我们党一经成立，就义无反顾肩负起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使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就是要使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是对人类的更大贡献。这三个方面的历史使命，概括而言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这样一种坚定的使命意识使得中国共产党不怕困难、不惧挫折、勇于付出、敢于牺牲。

其二，坚定的人民立场。人民群众是党实现历史使命的依靠力量，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党的初心使命。毛泽东将这种立场宗旨称之为“为人民服务”：“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人为人民利益而生，可谓生的伟大；为人民利益而死，可谓死的光荣。革命战争年代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是为了救人民于水火，为了人民的翻身解放。在和平建设时期，涌现了无数党员先锋，比如雷锋、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他们为了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广大党员干部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迎难而上、不畏艰险，被称为最美逆行者。人民立场使我们党能够扎根于人民、依靠人民，真正立于不败之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 李海青

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

其三，有效的自我革命。我们党要完成历史使命，就必须进行自我革命，打铁必须自身硬。国际上很多的大党老党之所以出现问题，丧失领导权和执政地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能进行有效的自我革命，管党治党存在严重问题。

推进自我革命必须在三个方面着力。一是注重思想建设；既要组织上入党，也要思想上入党。正是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才强调要补理想信念的精神之钙，正所谓“革命理想高于天”。二是加强组织建设。正如列宁强调的，组织能使力量增加10倍。我们党一贯注重组织建设，严密的组织体系、严格的组织纪律、有效的组织机制，使得我们党具有强大的组织力量和组织优势，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办好事、办成事，攻坚克难，完成使命。三是强力反腐败。反腐败斗争解决了我们党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我们党历史上一直注重反腐败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成就巨大，极大赢得了党心民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特别强调，新的征程上，我们要“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两袖清风”的于谦

□ 徐晓芳

“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在清代诗人袁枚的《谒岳王墓》中，提到了两位长眠于西子湖畔的历史名人，他们就是宋、明两代匡扶社稷的英雄岳飞和于谦。于谦的于忠肃公祠与岳飞的岳王庙相去不远，祠堂前殿有“百世一人”的匾额，对于谦一生功绩给予高度评价，殿门两侧有民族英雄林则徐撰写的楹联“公论久而后定，何处更得此人”。该祠在清代由林则徐带头集资整修，现已被列为杭州市第五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提起于谦，人们自然会想起他那首著名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一生，正如诗中的石灰一般，历尽各种磨难，却忠心不改，最终在史书中留下清白的美誉。

于谦为人熟知的功绩是在明朝中期领导了京师保卫战，击退了瓦剌大军的进攻，挽救了明朝覆亡的危机；而他深为后人景仰的品德，

是一心为民、清廉为政、两袖清风。于谦年少有为，23岁就考中进士，走上了为官之路。宣德初年，于谦升任御史之职，在巡按江西时，他不畏强权，毅然为数百名蒙受冤狱的人平反。明宣宗朱瞻基认为于谦能够担当大任，于是提拔他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于谦到任后，遍访辖区，考察民情、征求民意，及时将兴利除害的谏言上报朝廷。针对赈济贫困，于谦上疏提出每年三月令各府州县将谷物分发给贫困百姓，等到秋后收回，年老有病和贫穷无力的，予以免除。针对黄河水患，下令加固河堤，并按里数设置亭长，负责督促修缮堤岸。针对镇守将领律垦荒，下令将这些私田全部收为官屯，用以资助边防经费。于谦前后在河南、山西任职19年，可谓殚精竭虑解百姓之难、抚百姓之苦，深得民心，被贫苦百姓称为“于青天”。

于谦为官清正刚直，从不拉拢私交，每次进京述职时，都是两手空空。有人劝他带点土特产表示一下人情，他笑着举起袖子说：“我

带着两袖清风！”他为此专门作了一首《入京》诗，以表心志：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意思是说手帕、蘑菇、线香本是改善民生的东西，却因官场的不正之风，反而成为百姓的负担。我只带两袖清风去朝见天子，以免百姓对我说长短短。于谦用这首诗讽刺了当时官场拉帮结派、送礼进贡的不正之风，表达了自己坚持操守、清廉为官的铮铮风骨。

于谦一生清廉正直，为守护黎民、保卫国家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留给家人的，也只有两袖清风而已。据《明史·于谦传》记载：于谦日常生活非常简朴，居住的房子仅够遮挡风雨。土木堡之变后，于谦更加勤勉为国，经常就住在当值的寓所内，极少回家。后来，皇帝见他一心为公，不为家人置办任何家产，就专门赐给他一套西华门的府第。于谦坚决推辞说，现在国家境遇艰难，我怎么敢自己安居呢？然而，皇帝还是硬把府第赐给了他。于谦没有办法，就把历年所

得的玺书、袍服、银锭之类，逐一写上说明，封存在府第的正室之中，每年只象征性地过去看一眼，然后依旧住在当值的寓所内。京师保卫战中，于谦功劳最大，但他却从不居功，所得的赏赐能推就推。有人推荐于谦的儿子于冕担任要职，于谦坚决反对，绝不让儿子滥领功劳。于谦被诬陷杀害后，朝廷派人查抄他的家产，负责查抄的人惊奇地发现，这位曾经备受皇帝倚重的兵部尚书，家里竟然没有一点多余的钱财。

于谦的清廉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家族，他的后人虽然官位不显，但却能清廉为政、清白做人，族人为了让这一优良家风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就将家族堂号取名为“清风堂”。



下一讲主题：

《第二个百年,我们再出发》

主讲人：辛鸣